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Zhongguo Chubanjia
Chen Yuan
中国出版家
陈原

柳斌杰 主编
仝冠军 蔡长虹 张婧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中国出版家丛书
ZHONGGUO CHUBANJIA CONGSHU



柳斌杰 主编
全冠军 蔡长虹 张婧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任 益

封面设计：肖 辉 孙文君

版式设计：汪 莹

责任校对：胡 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出版家·陈原 / 仝冠军，蔡长虹，张婧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3
（中国出版家丛书 / 柳斌杰主编）

ISBN 978-7-01-018413-5

I. ①中… II. ①仝… ②蔡… ③张… III. ①陈原—生平事迹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6995 号

中国出版家·陈原

ZHONGGUO CHUBANJIA CHEN YUAN

仝冠军 蔡长虹 张 婧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5.25 插页：8

字数：200 千字

ISBN 978-7-01-018413-5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出版说明

出版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商业领域，同时，它也深深打上了“文化”和“思想”的印记。在这个文化场域中，交织着多种力量的动态关系，通过出版物的呈现和出版活动的开展，描绘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而回旋折冲于其间者，则是那些幕后活跃、台前无闻的各类出版人。他们自喻“为他人做嫁衣裳”，事实上，却是国家文化传承和历史记录的主要担当者，有出版发展的参与人和见证者甚至称他们所起的作用为保存民族记忆的千秋大脑。虽然扼据出版要津之地，却少见自家行当的人物传记出版。本丛书是第一次规模化地为这个群体中的杰出者系列立传，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出版事功中，折射出近代以降出版业的俯仰变迁，同时也见证着出版参与时代文化思想缔构及其背后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那些曾经彪炳于时的出版人，一方面安身于这个行业，以其敏锐犀利的时代洞察，在市场、经营与创意中躬行实践，标领乃至规划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门类；另一方面又在“安身”之外，显现出面向社会的公共性关怀与“立命”的超越性关怀，从职业而志业的追求中，服务于民

族解放、思想启蒙与文化进步的社会性经营，书写了出版人生的风采、风骨与风流。

本丛书所传写的 50 余位出版人，均为活跃于 20 世纪并已过世的出版前辈。中国古代也曾涌现了陈起、毛晋等出版大家，只是未纳入本书的传主范围。丛书在体例上，有单人独传与多人合传之分，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对传主出版贡献及其历史地位的轻重判别，许多情况下的数人合传，乃困于传主史料的阙如而不得已的选择，某些重要出版人如大东书局总经理沈骏声、儿童书局创办人张一渠等，也囿于同样情形而未能列入本丛书的传主名单，殊觉憾事。虽说隐身不等于泯灭，但这个行业固有的幕后特征多少带来了出版人身份上的隐而不显、显而不彰。本丛书的出版，固然是想通过对前辈出版事迹的阐幽发微、立传入史，能让同样为人做嫁衣者的当今出版人不至于觉得气类太孤，内心获得温暖，并昭示后来者在人生目标上，在家国情怀上，在出版境界上，追步于前贤，自觉立起一面促人警醒自鉴的镜子；同时更希望通过一个个传主微历史的场景呈现，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出版在产业之外，更是一项薪火相传的社会文化事业，它对时代文化的接引与外度，使其成为一种任何人都不可忽视的“势力”，在百余年来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故此，我们推出这套“中国出版家丛书”，以展示中国文化创造者的风采，弘扬他们的优良传统和崇高的职业精神，发掘出版史史料，丰富出版史研究和编辑史研究。

“中国出版家丛书”编辑委员会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六年四月

前 言

陈原曾打趣地称自己为一个“界外人”。何谓界外人？就是说，这种人很难界定他属于哪一界。或者他根本就不属于哪一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一生在文化领域与社科领域涉猎广泛，且均取得杰出成就，将他的学识和成果归到任何一类都不能代表他的整体成就：作为在中国进行推广世界语的先驱之一，他于1987年入选为国际世界语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作为翻译家，他的《列宁在一九一八》、《我的音乐生活》等作品脍炙人口；作为新音乐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编印的《战地新歌》曾一度风靡大江南北；作为地理学爱好者，他一生编译了十几种地理学著作；作为著名的语言学家，他填补了我国社会语言学学科的空白；作为一名出版单位管理者，他延续了一个百年出版品牌的价值与地位。若一定要将所有成就归集于一点，那对陈原的定位就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他人生的轨迹都是与推进民族进步的出版活动紧密相联。如沈昌文先生所概括，陈原为介绍“新思潮”而鼓励学习外语，为反对投降主义、研究“现代变化的世界”而写地理，

要批判极左思潮而“一头扎进语言现象和语言学的海洋”。也正如他在一本自传性的集子中所说，“我这一辈子只同书打交道，我记下的只是跟书以及由书及人有关的实事和断想”。

纵观陈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事业中的贡献，可大致概括为六点：

一、通过对张元济的再发现和再评价，提出报国之心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的出版理念。他在《一个爱国智者的思路历程》中说，“世人都知道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蔡元培，却很少知道毕生与他相濡以沫的张元济；世人无不知道‘百日维新’的六君子以及亡命异国的康梁，却不大记得在此役中被革职永不叙用的张元济；世人印象中总是把中国近代第一家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跟王云五的名字联想在一起，却很少有人记得创业诸君子中有一个学者兼企业家张元济。至于在文化史、思想史、出版史或爱国运动史的论述中，更少直接提到张元济。”而陈原则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为我们找回了一度被别人身影遮蔽了的张元济。在《张元济年谱》一书的序文中，陈原认为张元济不只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有魄力、有管理头脑的中国近代出版家，而且是一个承继了中国知识界几千年来忧国忧民、救国救民优良传统的爱国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编教科书——编工具书——整理古籍——介绍西学：通过这样的四位一体出版行为以振兴中华，这就是张元济和蔡元培经过痛苦的探索得出的一条路，一条知识分子为民族解放献身的路。”而陈原本人的出版生涯也正是大致遵循着这样的一条道路：编辑地理学、世界语等学科教材以开启民智，编撰《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服务学术，规划《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以引进西学，等等。陈原在晚年不断寻觅“具有独立人格和进行独立思考的真正的人”，

通过对张元济的再认识和再评价，他又找到了邹韬奋，找到了胡愈之，找到了出版的意义所在，找到了出版人的理想与信念所在。

二、保护《现代汉语词典》，参与国家工具书出版规划。陈原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编写了两本实用性质很强并略带工具书性质的书籍——《外国语文学习指南》、《英语分类词汇》，这为他今后在商务印书馆主持工具书编写工作奠定了基础。出版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现代汉语词典》，于1956年被立为国家项目，1958年年中正式开编，1960年以“试印本”形式广泛征求意见，至1965年完成并送审稿，但直至1978年才正式发行第一版。它的最终成功面市，陈原功不可没。1972年，从干校调回后，陈原作为国家出版局领导小组的成员，被派到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联合办事处主持工作。由于主张重印“文革”前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遭到“四人帮”攻讦。1974年3月起，姚文元借“燎原煤矿评论组”为词典提意见为由头，发动了一场针对《现代汉语词典》（试行本）的批判运动，称其为“封资修大杂烩”、“大毒草”，意欲将它毁成纸浆。面对严峻形势，陈原悄悄把已印好的《现代汉语词典》（试行本）封存在库房里，待形势略为好转，便以供批判研究的名义赠发各学术研究机构作内部发行，直至1978年正式出版。这在当时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1975年前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由陈翰伯先生主持，制订了一个词典工具书的出版规划，陈原全身心投入其中，并撰写了《划清词典工作中的若干是非界限》，明确提出工具书编写工作要摆脱极左的政治色彩，为那个时期工具书的编写指明了方向和方法。陈原为繁荣我国辞书出版工作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人民也不会忘记。

三、主持规划《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助力新启蒙运动。新

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就倡导出版界积极翻译出版国外经典的社会科学著作，当时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的陈原连同戴文葆、史枚两位一起，开始草拟翻译出版规划，涉及图书两三千种、文字量一亿多字，这便是之后享誉国内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前身。随着1958年商务印书馆恢复业务经营，由陈翰伯主持工作，并确定以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论著为主要任务，这个庞大的翻译出版项目便转给了商务印书馆，但陈原依旧参与其中，制定了一个涉及1614种图书的庞大规划。“文革”前这个规划仅零散地出版了几种。直到1979年陈原主持商务印书馆，他才有机会延续自己二十年前未完成的工作，先是清理了之前已印刷的单行本，亲自定名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并规划、指导具体的编译和出版工作。这套丛书在选题方面涵盖西方社会由古至今在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等各个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保证出版物的学术品质，陈原先生更是将当时文化界、学术界已饱受煎熬的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召唤到这套丛书的编译工作中，使文化学术活动在“文革”前后得以延续作出实际的贡献。《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已陆续出版四百余种，此举堪称“文革”后的新启蒙运动。1982年，当这套丛书开始刊行时，陈原先生不无感慨地说：“这许多书的作者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他们踏着前人的脚印，开拓着新的道路；他们积累了时代的精华（当然有时亦不免带有偏见和渣滓），留给后人去涉猎，去检验，去审查，去汲取营养。”这套丛书也为商务印书馆奠定当代学术出版大社、名社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1984年陈原先生被调离商务印书馆，到中国语言文字委员会主持工作，但他仍在兼任商务印书馆的顾问，继续落实外国学术名著的出版规划。

四、创办《读书》杂志，开辟浩劫之后“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文化园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如何让文化界、学术界和出版界这潭死水重新清澈并激起波澜，是包括陈原在内的许多出版人共同思考的问题。陈原和几位挚友商量创办一本新刊物，如他自己所说：“噩梦终于醒过来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扣人心弦，扭转乾坤的全会开过了，破晓了！该有一个园地，让读书人抒发他们的情怀；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呼唤被压抑或被歪曲了的良心。园地在哪里？办杂志。办一个讲真话的杂志。办一个不讲‘官话’的杂志。开垦一个破除迷信，破除偶像崇拜，有着‘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园地。不讲大话，空话，套话，废话；不崇尚豪言壮语，不夸夸其谈，不随风倒，也不凑热闹，保持冷静客观头脑，独立思考。不把自己装扮成为人师表那样的道貌岸然，自然、朴素、平等，完全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是杜绝棍子！”《读书》杂志于1979年4月10日创刊发行。2004年，沈昌文先生回忆说：“《读书》创办时，是属于国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的，机构则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义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当时不是独立机构，仅有一名义而已）。的确，这一来，出版界的各路英雄豪杰很大一批集合在一起了。”欲让国家在浩劫之后重生，欲让思想在沉寂之后苏醒，杂志创刊的目的应是先唤醒读书人的良知和思想，“《读书》是读书人办给读书人看的杂志”。刊物定位于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内容以评述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为主，涵盖文史哲等社会科学，以及建筑、美术、影视、舞台剧等艺术形式的评论，略带部分自然科学内容，杂志的主要支持者与撰稿人大都为当时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学识、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几位杂志创办者更是将自己压抑已久的激情全部倾注在了这本刊

物上。在创刊号中，一篇《读书无禁区》的文章更是激起各界人士甚至民众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1999年，陈原先生回忆起那段创刊时的洗礼时说道：“《读书》不是在暴风雨中诞生的。《读书》是在龙卷风过后，穹空露出一角蓝天的日子里诞生的。它好不容易熬过二十年。这二十年是富有魅力的二十年；同时也是荆棘丛生的二十年，风霜雨雪的二十年。但毕竟是充满希望的二十年。如今《读书》长成了，壮大了，在读书界生了根。然而它起步和学步头几年的人和事，却长埋在我的深层记忆里永远抹不掉……二十个春秋，它走过的路决非平坦，但它毕竟走过来了。《文心雕龙·知音第四十八》云：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

五、务实尽责，定立出版岗位职责，树立新中国出版管理新思想、新作风。1949年后，新中国出版业面临困境，而党和政府又亟须通过出版物向人民宣传并展示一个全新国家的社会面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就先行成立出版总署，可见党对出版行业的高度重视，而新的人民政府开始采取各项措施不断强化国营出版力量，并逐步开始对私营出版业进行改造，直至1956年中，对出版业包含发行业和印刷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对新中国出版业的行业规范和要求成为出版业界各层面需要面对的问题。陈原先后在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国际书店等出版机构工作，延续着自己的写作与编辑生涯，继续发挥着自己的才智与热情。1952年，陈原被任命为国际书店的副经理，年末又被任命为人民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主任，他的管理能力与务实敬业得到全社上下的认可。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期间，陈原直接负责拟定了一些编辑工作制度，在出版社日常管理和业务流程管理的建章立制方面也是贡献良多，直到1957年

开始担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他对于编辑出版的制度建设始终高度关注。在担任出版管理单位领导期间，他把自己一线工作的经验总结概括，逐渐完善了行业规章制度。在此期间，他与胡愈之先生等人逐渐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作为上级领导的胡先生的很多想法和建议给予陈原在具体工作中诸多指导。“文革”到来以后，中国的出版工作全面停滞，陈原潜心进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直至70年代末被调回商务印书馆，之后被正式任命为总经理、总编辑、党委书记。在他的带领下，商务印书馆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出版工作。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出版实践及出版行政管理工作，陈原先生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出版管理思想，包括出版规划管理、出版质量管理、国际合作出版、传播新科学新技术等现代化的管理思想。他十分善于以管理者的角度思考并研究出版工作，常说的话是，一个出版社的品牌一定要有特点，“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严谨出版内容，严控出版流程，严把出版品质，平衡出版物的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由此观之，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提出了出版产业化的理论，并积极实践之。同时，尊重人才、培养人才也是他做好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开办编辑培训班，举办各类讲座，让年轻编辑积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等等。

六、时刻与时俱进，重视科技革新，20世纪80年代后将信息化积极引入国内出版业。在陈原看来，作为一名出版人要懂得时刻与时俱进，善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才易于转变传统观念。1984年，他调离商务印书馆，到中国语言文字委员会主持工作，开始深入研究语言学，并致力探索语言学与出版更为内在的联系。在自己的论著中，他谈论申农的理论，言及语言信息的“比特”，并勇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语言作为‘信息’同申农信息论中所处理的信息是不完全

一样的，不一样就在于语言的社会性，用纯自然科学的方法（包括统计物理学的方法）去分析社会语言，往往会得出超社会的结论。我的社会语言学体系与西方社会语言学体系不同的根本点，也就在于此。”陈原说自己是中国出版业较早使用电子计算机的出版人。20世纪“80年代初，以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对出版工作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许多出版工作者还不甚了了。作为出版家，陈原一直关注新技术革命对出版工作的影响，他在多种场合就‘新技术革命对出版工作的挑战’这一专题发表演讲，为出版界做信息革命的启蒙工作。”他还出访世界各地，参加关于出版工作电子化的会议。根据于淑敏老师的记述，“陈原先生在研究社会语言学的过程中，接触了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思想。他把‘三论’思想的精髓贯注于出版工作中，对出版工作既作为普通信息论的对象，又作为控制论对象来考虑。这两个不同的考察方式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揭示出版的系统性质，以及多方面的属性和复杂的关系。”此外，“陈原认为，出版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通常都把出版—印刷—发行这三个子系统作为这个系统工程的基本模式。在这个系统工程中，每个子系统的运转，必须同前一个和后一个子系统协调一致，而且应当力求协调得完整无缺。”在商务印书馆创办《馆讯》，是陈原先生现代化信息管理意识在出版工作中的最早体现。早在1979年8月18日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总编会上，他说道：“有个工具或媒介，向全馆同志及时沟通情况，即所谓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外情内达，以便吸引全体同志把力量往一处使。因此决定每逢星期一出版一期《馆讯》。”1979年8月20日第一期就如期出版（后改称第X号），由总编室负责人定稿。头两年每期印出后，陈原都批注意见退给编者，提醒他们注意改进。“最

初几期，连编校者也看不起《馆讯》，实践证明，愈来愈吸引读者包括上级机关的读者，……上上下下都喜欢这个工具，因为它信息多（没水分，没废话），字数少（一目了然），有倾向性（即有指导意义）。从现代信息论的角度来看，这一内部媒体实际就是一个信息管理与反馈系统。

今时今日，为陈原先生作传既是一件缅怀先辈的荣幸之事，又是一件备感压力的事情，同时还是一段“洗心革面”的旅程。压力主要来自于陈原先生生平阅历的丰富、思想的灵动、学识的广博与现存资料的零散、作者把握能力的不足、撰写时间的紧迫之间的矛盾。陈原先生自传性的文字大都集中在《我的小屋，我的梦》、《隧道的尽头是光明抑或光明的尽头是隧道》等仅有的几本行文流畅、文笔飘逸的小书中，虽然读来如坐春风，却是信笔由缰的性情之作，许多细节还有待我们透过文学性的描述去深入挖掘。目前关于陈原先生的系统研究还不多，虽也有学者就此呼吁过，但目前为止，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权威的、详细的陈原先生的年谱。不过勤能补拙。我们面对累积成堆的资料，渴望在其中搜寻到关于前辈一切有价值的内容，生怕遗漏任何一段有意义的语句，特别是翻开一本本已经枯黄绝版的旧日书籍，淡淡的霉变之味让人瞬间沉醉在历史的波澜之中。说“洗心革面”，其意在于，陈原先生如一面镜子，以人为镜可以正衣冠，我们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看到他时时提及编辑的修养，一次次为其人格和境界所打动，这又一次次“逼迫”我们反观自身，反观当下的出版业和出版人。在陈原先生离去近十年之际，我们仅期待通过对此书的努力，让同业者强化出版者的责任和信心，在嘈杂的文化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归宿。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青青子衿家国梦	001
第一节 语言救国梦	003
第二节 艺术救国梦	018
第三节 文学救国梦	035
第四节 出版救国梦	051
第二章 天翻地覆新出版	081
第一节 1949 年后的出版业	082
第二节 从出版社到出版局	097
第三节 《知识丛书》与《东方红》	123
第三章 不是空白的空白	139
第一节 政治运动中的陈原和出版界	140

第二节 《现代汉语词典》事件	151
第三节 漫步世界语：沉醉与解脱	159
第四章 又向书林努力来	163
第一节 忽如一夜春风来	163
第二节 风中的蒲公英	167
第三节 读书无禁区	175
第四节 重新发现张元济	181
第五章 千丈之松云中龙	189
第一节 改革精神与战略思维	190
第二节 日出一书：多出书，出好书	194
第三节 品质至上	197
第四节 开放心态与市场意识	199
陈原编辑出版大事年表	204
参考文献	222
后 记	225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惊扰了中华帝国这头东方雄狮的睡梦，却并未惊醒被这千年迷梦笼罩着的绝大多数国民。只有零星的先知先觉者，看到封建体制的种种弊端，看到国民精神的萎靡不振，看到社会阶层的僵化凝滞，在令人窒息的铁屋中发出几声急迫的呐喊。陈原的同乡、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把希望寄托在少年一代的身上，写出了激情飞扬、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但殷勤的期望并没有换来热切的响应。